

央视大剧《人世间》：总有热乎乎的日子与人，在诉说人间值得

王彦

它从如今看来恍若隔世的1969年讲起,那是郑娟串两串糖葫芦能挣一分钱的年代;它还让一群40+演员从20多岁的年纪演起,包括演他们的纯真和风华正茂。可就是这部处处透着“老”的电视剧,成功“圈”住了全年龄段观众的心。

58集长篇电视剧《人世间》自1月28日在央视一套和爱奇艺开播,每一次更新,都占据国产剧热度榜首。在如今年轻观众追求倍速看剧、看短剧、看“不装嫩”表演的环境里,《人世间》的前半程已成功松动了网生代的观剧习惯,让90后、00后与50后们一起看得百转千回。

作家梁晓声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原著自然为电视剧提供了珍贵母本。而影视改编的二度创作者们——从编剧王海鸰、王大鸥到导演李路,再至雷佳音、辛柏青、殷桃、宋佳、萨日娜、丁勇岱等一众演员——真正示范了一部好剧是编导演服化道全流程匠心的环环相扣。观众每晚守候、网友频频催更的电视剧《人世间》,还原了小说里突出的年代感与命运感,丰富了影像化后耐人寻味的无尽细节,还提亮了跌宕人生、世情百态下的故事底色。它让观众看见,即便生活是悲欢离合的循环往复,也总有热乎乎的日子与人,在诉说人间值得。

绵密的细节,让“我们”代入了他们的情感与命运

电视剧开篇,带着史诗感的俯瞰镜头切入了1969年东北。长春市光字片周家,一家五口人在拍完全家福后就要天各一方了。父亲去西南“大三线”,长子周秉义和女儿周蓉都要“上山下乡”,只留母亲和小儿子周秉昆守家。故事就随周秉昆的视角,随他走进木材厂、酱油厂、出版社,去看眼前人、身边事。

主创花了大力气营造准确的时代风貌。画面扫过林海雪原、国企车库、集体林场、国营饭店……大工业时代东北的冷冽粗粝扑面而来。镜头一推入“平民窝子”光字片,则是另一种气息。屋檐叠着屋檐,街道变窄成了巷。外人会迷路的光字片里,从院角的鸡窝、檐下的冰溜,到周家的炕头、门帘、锅碗瓢盆,都透着浓浓烟火气。但对《人世间》而言,物理层面的讲究只是打造沉浸感的第一步,真正让长辈忆往昔、年轻人知过去的,不止于严丝合缝的视觉符号,而是绵密的服务于人的细节。正是信息量充盈的视听细节,对上了观众心里对年代和人的认知,让“我们”代入了他们的情感和命运。

描画亲情,细节时而诙谐。周秉昆比起哥哥姐姐憨直了些,但胜在本分孝顺。母亲不识字,他理所当然担下读信、写信的任务。母亲大晚上兴起要给父亲



写信,他嚷嚷不情愿但也还是钻出被窝拿起纸笔,顺便还跟母亲撒个娇,求她给自己织条新毛裤。小儿子身上紧绷绷的,正是姐姐穿过的毛裤。父亲寄来长长家书,整整十页,周秉昆慢条斯理地读,一边揣摩父亲潜台词,夹叙夹议的节奏急坏了等下文的母亲。母子温情,家人的牵挂,悉数嵌入了嘻嘻哈哈的读与听。后来,周秉昆同父亲愠气,郑娟接过纸笔,牵起父子间东北与西南的往来。一样是写信,多了分传统中国式父子关系的欲语还休。

勾勒时代,细节多是举重若轻的。周秉义和周蓉是学霸型文艺青年,剧里用“书”四两拨千斤。周秉义去兵团报到前关照弟弟保管好61本书,强调这些书放在工人家庭才安全,寥寥几笔点出特殊的年代背景。周蓉追加叮嘱,“里边还有我三本”,《叶尔绍夫兄弟》《安娜·卡列尼娜》《唐诗三百首》,精巧暗示了一个诗意浪漫爱情至上女子的未来。

多数时候,细节是伏埋千里的。父亲周志刚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前期老工人的戏份不算多,但前后呼应的戏剧“扣子”丰满了父亲的形象。他传统,花几年时间才消化女儿擅作主张为爱下乡的事实,也在难得回家探亲时为小儿子“爱上寡妇”的试探之辞大光其火。他极重道义,终于跋山涉水探望女儿,见女婿第一面便明确,周家祖训做人要懂报恩。一个“恩”字后来成了他接受“寡妇”郑娟成为周家一分子的最大驱动,因他瞧见了与美丽容颜不相符的布

满茧子的手,瞧见了干干净净、脸色红润全然不似昏迷两年的老伴。一家之主的他明事理,既设在郝冬梅家“落难”时劝长子分手,也能在时移世易后常常体谅儿媳的难;可他偶尔又不那么通情,带儿女三对夫妻串门拜年,跟邻里乡亲念叨周家走出两名北大学子的荣光,却忽视了为周全哥哥担岁月静好、替全家扛过艰难光景的小儿子夫妻。

绵密细节渗透在《人世间》里,人们得以看见一个有斗嘴但不撕裂、有个性但又相濡以沫的原生家庭。这样平凡的周家,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是中国社会最普遍常见的原子。观剧的家庭对上了剧中一家人的信道,观众自然会认可,时代进程里周家众人的浮沉,就是当代中国百姓五十年生活变迁的真实注脚。

镜头的诗意与明亮,让小说里的人心向善更闪闪发光

《人世间》荡开的,是百姓生活史,何尝不是中国社会变革史。这片土地上50年来相继发生的三线建设、上山下乡、恢复高考、知青返城、对外开放、出国潮、下

58集的篇幅内,电视剧《人世间》从上世纪60年代末起跨越近50年,以平凡的周家三兄妹视角切入,多方位、多层次描绘了近半个世纪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和人情百态。左图为雷佳音与殷桃分别饰演的周秉昆与郑娟,右图为宋佳饰演的周蓉,下图为剧中呈现的“六小君子”春节聚会



海、国企改革、搞活经济、棚户区改造、反腐倡廉……种种变革,都会在58集的长卷中一一展开。评论家李师东对原著的点评被写入了电视剧的海报上,“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在悲欢离合中抒写情怀和热望”。剧中处理最圆融的,就是对“烟火道义”和“个人热望”的还原。时代风浪呼啸,人生潮起潮落。剧版在遵从原著轨迹同时,用镜头的诗意与明亮,让小说里的人心向善、人与人之间的守望相助更闪闪发光。

物质匮乏的年代,剧里感受不到被击垮的绝望,相反,郑娟手里的糖葫芦、旧门楣上的新春联、母亲给周蓉织了十多年攒成一沓的毛衣,都轻易触发观众的泪腺。红色的明娟,照亮了小人物对美好日子的热望。大片逆光里,善良又诚信的周秉昆在郑娟人生里登场,给孤儿寡母以生活勇气。一样的阳光洒在郑娟身上,她悉心照料周母的样子,是周秉昆心里,也是观众心里天使的模样。更不消说,“六小君子”一起扛过的肉、守过的年、打过的架,都是天寒地冻时的人心

暖意、物质困窘里的淳朴情义。

物质丰盛了,人心会变吗?剧里细写了周秉义同父亲、岳父的两次交心,他所求的小家之谋、大家之道,呼之欲出。周秉昆放下“铁饭碗”去了出版社三产,敢闯敢试的意识初显。一年一度初三聚会,如约而至的他富贵不相忘。《人世间》里还多次出现春节团圆的景象和全家福照片,剧集以家为支点,撬动历史洪流中各色人的遭际,也用家的架构串起中国社会认同的仁义礼智信。有这样的价值底色在,人物因处境扭转而遇见的尴尬、迷惘、挣扎,才能真实曲折却又不失激荡。

值得称道的,还有剧中不同层面、有血有肉的群像。乔春燕和郝冬梅,一个光字片“社牛”,一个本是大院里的女儿。无论出身如何,她们都敞亮真诚。乔春燕的工作大起大落,可她总用炽热的自己温暖周遭,是人群里的小太阳。郝冬梅尝过“赢在起跑线”的甜头,可下乡后,身份与人情冷暖的落差在她身上见不到怨天尤人的痕迹。她不仅积极勤

勉成了干农活的一把好手,还以德报怨,让出推荐上大学的名额。酱油厂的曲书记曾是工人们嘴里无情老太太,但她明人不说暗话,与年轻人一番沟通,不仅解了工人们心头的结,也让观众喜欢上这个公私分明、对年轻人爱得细腻也爱得严厉的老一辈国企干部。还有看似刻薄的陶俊书,连这个推动情节的功能性人物,剧里也给了她唯美浪漫一幕。前路渺茫又怎样,黄纸板上的黑白琴键在,姑娘的梦想就在。幕布揭开,灰尘扬起,失了音准的旧钢琴弹得出艰难岁月下的罗曼蒂克,逼仄命运中的广阔天地。那是陶俊书的,也是周秉义他们怀揣梦想艰苦奋斗的尊严与荣光,更是有情有义、坚韧担当、善良正直的中国人形象群体的诗意注脚。

有了这群始终相信理想主义、相信人间正道的角色,《人世间》的后半程,当他们的命运岔路随剧变的时代越见清晰,观众依然会相信——即便历尽人生的悲欢离合、人际的纠缠厮磨,人们心底的朴拙善良不会被雨打风吹去。

“笨小孩”的奇迹抑或“小人物想象”?

——评电影《奇迹·笨小孩》

尹一伊



小孩》中饰演主人公景浩

2022年春节档,电影《奇迹·笨小孩》在档同期众多竞争对手中获得了口碑和票房的好成绩。自《我不是药神》以后,文牧野似乎掌握了一套讲述现实题材小人物故事的创作方法:故事工整、节奏准确,着力于刻画小人物群像,突出人物之间的情感联结。《奇迹·笨小孩》也延续了《我不是药神》的剧作模式,讲述了以景浩为代表的“小人物”们在生活的重压下历尽艰辛、最终成功的励志奋斗故事。同时,影片又明显受到《当幸福来敲门》这类好莱坞剧情片的影响,对于叙事节奏、人物关系的把握和处理显得十分娴熟。

从这个角度而言,《奇迹·笨小孩》是很适合春节档的成熟剧情片,甚至可能是这个春节档内除了动画电影之外最“合家欢”的剧情片。一方面,借由深

圳这一极具象征意味的故事空间,影片恰到好处地触碰到了一部分社会现实议题,通过对小人物群像的刻画传达了现实关注。另一方面,这些现实关注几乎从未脱离中产观影人群的“小人物想象”,而“奇迹”故事不可避免地将其进一步消解,最终搭建起一个励志、温暖的核心框架。

以情为驱:创业故事的情感表达

《奇迹·笨小孩》在剧作上可称是小人物励志剧情片的范本,工整得可以在编剧课堂上进行“节拍拆解”。

主人公景浩在母亲去世后与妹妹在深圳相依为命,从大学辍学成为了一

位手机修理师傅。为替妹妹筹齐手术费,景浩尝试翻新机、零件拆卸零售等赚钱方式却屡遭重创,走投无路之际,景浩孤注一掷赌上所有积蓄,最终在伙伴的支持和帮助下历尽艰辛、获得成功。故事背景设置在深圳,这一城市空间带有太过强烈的象征意义,几乎不可能与“改变命运”“创业”“奋斗”等关键词切割开来。外来务工人员正是深圳的标签之一。在深圳的地铁上,能够轻松听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方言,而影片中屡次出现的几组城市鸟瞰镜头,则有意将深圳刻画为一座镜像之城。“上层”的CBD里,高耸威严、窗明几净的高层办公楼林立,而“下层”的城中村等地区,则密布廉租房、小商铺。可以说,深圳的地方性为影片的真实性提供了最重要的现实基础,也借由镜像般的城市影像树立起一组剧情内未必着重强调的对立关系,为讲述大城市中的“小故事”奠定了现实基调。影片中,网吧大神等具有现实关注度的场景和类型人物也带有明显的“深圳特色”,而片中屡次出现的蚂蚁符号则不断昭示小人物的命运——卑微、弱小,但坚忍不拔。

尽管影片本质上是在创业之城讲述创业故事,但不同于同类题材影片惯常以“追梦”“奋斗”为宏大主题,《奇迹·笨小孩》尝试把景浩的人物动机落在亲情上,有意地弱化了景浩希望改变命运、出人头的野心,使得影片看起来不至

于太过“成功学”,转而以兄妹之间的羁绊打动人心。“情感”也因此成为影片最重要的叙事线索,也是影片中的小人物得以在大城市中生存甚至完成“奇迹”的唯一仰仗。在影片中,兄妹情、忘年交、伙伴情谊等一系列情感维系,不仅基本连接起所有人物的动机,也构成了情节上最主要的几处转折的合理性:一是梁叔儿无条件地帮助景浩开始“创业”,包括后续钟老的“入股”,是具有本土特色的“熟人社会”式的邻里情;二是景浩等人替汪春梅出头,一场“群架”在叙事上完成了团队建制,是侠义式的拔刀相助,在此段落后的婚礼情节,更是对团队成员之间类家庭情感的一种渲染;三是景浩对赌任务濒临失败时团队好友的鼎力支持,则是典型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集体主义情感叙事。除主要人物外,章宇饰演的高空作业队队长和田壮壮饰演的门卫爷爷,也被赋予了天然的善意。这几种本土化的、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情感类型,贯穿了《奇迹·笨小孩》故事的始终,成功地引起了观众的共鸣与共情。

剥离现实:“笨小孩”的“奇迹”何以可能?

不过,《奇迹·笨小孩》中的情感叙事固然动人,但同时也是高度假定的,仍然

服务于个人奋斗的内核框架。对比人物背景类似的影片《我的姐姐》,《奇迹·笨小孩》以一种近乎虚构的方式切断了失去父母的少年兄妹/姐弟可能面临的真正的现实问题,直接将兄妹两人从繁琐的社会关系、家庭关系、土地关系中剥离出来,以保证奋斗故事的完整性。尽管易烱千玺贡献了相当精彩的表演,景浩这一角色仍然带有一种悬浮感——他所对抗的基本上不是非法组织就是极端天气,从开头的翻新机政策到台风、再到被违法炼金组织偷走零件,景浩要面对的大都是偶然性很高的外部干扰。而他自身的境遇,以及真正有力度的难题则被大幅忽略了,最终留下的只有房租这一浮于表面的困境表达。妹妹景彤则基本成为只负责提供情感输出的工具角色,几乎完全缺席主要叙事。

同样,影片中其他人物的设计尽管涉及包括三和大神、务工人员、工厂维权女工等现实形象和社会议题,但也都因服务于奋斗故事的内核而流于表面,成为了一个个标签。与景浩景彤兄妹类似,其他人物也在团队建立之初就迅速地从生活场景中被拔了出来,进入了好景工厂这一多少带点假定性的工作空间。此后,大部分人物关系的建立和变化也在这一场景中发生,观众基本无从得知角色们的生存现实,人物群像的现实底色也都被景浩一手建立的工厂所替代。失去生存现实的角色们也失去了生活质感,只能靠被“困”在工厂内

的人物关系和情感连接来塑造人物。而值得注意的是,所有人物给予景浩的善意也几乎是无私而无后果的:梁叔可以轻松抛下福利院的白班工作,队长可以给景浩多开工钱,刘恒志的妻子也可以开着工作吊车来援助……正因为角色的生存现实被隐藏了,这些善意本该因为现实的高昂代价而显得珍贵,在影片中的给予却过于轻松。

从创作角度,完全能够理解这些情节的技术合理性。在《我不是药神》中其实也出现过相似的问题,只是被影片题材本身的特殊性所中和了。但是,如果《奇迹·笨小孩》对草根生活的可贵传达正是立足于表现不完善的福利保障下个体生存的不易,那么这些轻易赋予的善意削弱了影片的真实性,使得景浩作为小人物的境遇变得个人化、特殊化,可谓遗憾。尤其当影片结尾,景浩以成功企业家的形象再次出现在台上而众人都以公司职员的形象坐在台下时,我们很难不产生“情感被剥削”的违和感。

诚然,《奇迹·笨小孩》是合格的春节档励志剧情片,而观众永远需要温暖、希望和感动。但是,如果“奇迹”只能依靠纯粹却失真的情感关系来实现,“笨小孩”的讲述是否会上止步于满足城市中产观众的对小人物“咸鱼翻身”的想象,而从未触碰真实?

(作者为传播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师)